

處理「雙非」不可一刀切

□曾淵淪



宏觀微觀

最近，候任特首梁振英召開記者會時表示，2013年私家醫院的雙非孕婦接生的名額應該是零。他同時說，將來不保證雙非父母在香港所生子女可獲得永久居民身份。

梁振英的話引來三種反應：第一種反應是部分反對派認為梁振英在未上任之前對現任政府指指點點，是越權，是逼現任政府成為跛腳鴨；第二種反應是，另一部分反對派卻認為梁振英這麼做沒有錯，因為2013年私家醫院收多少「雙非」孕婦接生的確是梁振英上台之後的事，現任政府的確不應該代梁振英拍板決定該由梁自己決定的事；第三種反應是民間反應，香港民間一般是反對「雙非」孕婦在香港生孩子，因此對梁的話反應是正面的。有支持反對派的電台主持，甚至在訪問反對派政治人物時問梁振英已經在發表聲明後得了分，反對派該如何應對？

是的，梁振英在表態後，在民望上是得了分，也因此，反對派也就點到即止，不敢在這個問題上死纏

不放，指梁振英未上任就對特區政府現任官員指指點點，部分反對派也認為梁振英所談的是2013年的事，他的確有權干預現任政府代他處理2013年的事。

很明顯，梁振英的施政理念很明顯與曾蔭權不一樣，也因為不一樣，在現階段的過渡時間，一些跨越兩屆政府交接的重大事務的決定的確很敏感。

事實上，不論是反對派、建制派，在梁振英談論2013年「雙非」孕婦的名額之後，在立法會上一致反對撥款興建垃圾焚化爐。梁振英倒是沒有在垃圾焚化爐上發表過意見。

實際上，垃圾焚化爐的預算如果是在一年前放上立法會，可能已經通過，現在立法會議員們一致反對撥款，只是因為現在距離兩任政府交接的時間太短了，不如留給梁振英決定。

有可能影響海外精英流入

為什麼梁振英沒有在垃圾焚化爐撥款上表態？一個可能原因是他自己仍未有決定；另一個可能原因是他也知道曾蔭權政府的確有權力在他的任期內興建垃圾焚化爐，正如我之前提到，如果曾蔭權政府早一年提出預算，可能早已通過。

或許，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現任政府要提前為2013年的「雙非」孕婦的名額做決定？

一些反對派的議員也公開指斥周一嶽局長不應該為2013年的事做決定。我倒是明白，為什麼現任政府得提前為2013年的名額做決定。理由是一名孕婦懷孕到生孩子，長達10個月，期間是需要預先做很多檢查，一般上，孕婦是在懷孕一個多月兩個月裡才知道懷孕，然後開始預約產科醫生與產房床位。換言之，預約期與生小孩的日子約8個多月，明年一月想生小孩的產婦現在已經要預約了。所以，現任政府的確有必要在現階段宣布明年可以接收的雙非孕婦小孩的名額。當然，梁振英的政策與現政府的政策可能有分歧。因此公開發表他的意見，並受到周局長的配合。

香港民情是反對「雙非」孕婦來香港生小孩。不過，之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指出所謂「雙非」的定義要進一步細分。因為若照字面解釋，「雙非」即父母不是永久居民者。可是，香港有不少專業人士來自海外，他們以工作准證的普通居民，非永久居民身份住在香港，如果醫院完全拒絕這些人的妻子在香港生小孩，那相等於逼這些人才馬上離開香港，這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打擊很大。因此，我認為梁振英及其團隊在現階段有必要與現任政府更進一步詳細討論所謂「雙非」孕婦的定義。香港是移民的城市，香港不能拒絕海外人士的流入，我之所以對「雙非」問題特別敏感，是因為當年我的兩個孩子在香港出生時，我

「雙非」定義需進一步明確

除了「雙非」孕婦在香港生孩子的「雙非」定義需要進一步明確化之外，梁振英也提到不保障「雙非」子女將來能獲得永久居留權，我認為在居留權上，我們也應該詳細區分，定義各種各樣的「雙非」父母，非永久居民可以是一般居民，這些人包括專業人士，也包括家務助理，梁振英說他傾向以法律方法來處理「雙非」子女的永久居留權問題。前一陣子，一群全國人大代表也公開簽名支持由人大常委通過釋法來處理此事。基本上，香港民情是支持通過人大釋法來解決「雙非」子女永久居留權的問題。因此，我估計梁振英很可能也會傾向於通過人大釋法來處理。

不過，我認為，在釋法之前，是有必要更全面的考慮各種各樣的情況，不好因為民情洶湧反對「雙非」而一刀切。

該分開永久居留權與一般居留權，如果「雙非」父母根本就沒有住在香港，那麼不讓他們的孩子擁有香港的居留權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如果「雙非」父母是住在香港，在香港工作的專業人士，我認為他們的孩子是應該有香港的居留權。然後，等這些孩子住滿7年，再派發永久居留權給他們，而不是一刀切地將這些人的孩子趕出香港。

作者為城市大學副教授，博士



「零配額」

保龍

掌握捍衛海疆主動權



周金浩

近來，中國在東海及南海的主權爭議上，與周邊國家屢生糾紛。例如早前菲律賓軍艦與中國漁政船的對峙事件。中國船隻也經常與越南在海上發生衝突，今年二月，越南傳媒指該國漁船在西沙海域遭中國海監船槍擊，船身中彈。日前，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華盛頓演講時，揚言要買下釣魚島，中方強烈譴責有關言論。

如何應對海域權益爭議，中國內地有不少討論。有人認為中國應展示強硬姿態，捍衛海洋資源利益及國家安全，以樹立威信。然而，東海及南海的主權分歧牽涉到許多國家的利益，是一個敏感的地區。在鄰國的蓄意挑釁下，中國在海域爭議上需小心處理。

「不打沒把握之仗」

筆者認為毛澤東的軍事思想解決海域爭議具有指導和借鑒意義。「以弱勝強」、「不打沒把握之仗」是毛澤東軍事戰略的中心思想，無論在抗日戰爭或國共內戰時期，面對敵方的精良裝備和強大軍力，毛澤東仍能運籌帷幄，沉着應戰。一旦出手，往往以兩三倍的兵力殲滅敵人，帶領軍隊取得戰爭的主動權和勝利。在現時複雜的國際大環境下，中國應謹慎行事，步步為營，先掌握主動權，再選擇最有利的時機出手，不應受群小挑釁，便拔劍而起，挺身而鬥，亂呈匹夫之勇。古語有云：「小不忍則亂大謀。」

事實上，美國對於東海及南海的局勢演進有決定性影響。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問題上的態度變得越來越強硬，和美國在背後支持不無關係。例如中菲艦船在南海對峙剛過不久，美國和菲律賓即明目張膽地在菲律賓巴拉望島以西的南海海域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矛頭明顯指向中國。故南海爭端最終會否鬧大，決定權在美國手上，假設美國能壓制群小搞事，相信紛爭會很快平息。

□周金浩

有領導性的西方傳媒提出，國際仲裁是解決南海紛爭的最佳辦法；又提議由印尼來牽頭仲裁。筆者認為此觀點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印尼部分海域毗連南海，絕對不是中立的第三者，不適合為仲裁者。即使糾紛交由更高級的國際機構，例如委託聯合國處理，亦不能保證仲裁結果是客觀公正的。現時不少國際機構受到某些強國影響，立場存在取態，仲裁過程未必依照國際法公平進行，導致仲裁結果可能出現偏頗。況且，要求中國和所有牽涉海域爭議的國家進行集體談判是不切實際的做法，對中國也有欠公平，因為不同國家存在爭議的水域不同，集體談判只會產生更多的混亂和爭端。假設美國和其他國發生糾紛，相信亦會選擇軍對單談判，而不是集體協商。其實從上世紀開始，中國已提出以和平談判為原則，致力就解決南海紛爭和東盟鄰國逐一協商。

選擇適當時機出手

在近日東亞局勢日益升溫的情況下，中國與俄羅斯亦密鑼緊鼓地準備在黃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此前，中俄兩軍已多次舉行聯合軍演，由於兩國毗鄰，接壤地帶漫長而廣闊，保持友好關係有利雙方長遠發展。

俄羅斯雖為歐洲的一部分，卻和西方國家有着長久的歷史隔閡和矛盾。兩者之間齟齬不斷，成為世仇。例如俄羅斯分別於1812年及1941年遭到拿破崙和希特勒的入侵；冷戰期間，蘇聯傾舉國之力與美國進行軍事實質，結果拖垮了本國經濟，導致1991年解體。由於俄羅斯同屬西方文化，擁有好勝特質，過去十多年在很多政策和事件上與西方國家針鋒相對，並經常展示挑戰美國霸權的強烈企圖及決心。相反，中國文化講求兼容並蓄，和平共存，並沒興趣挑戰美國的地位或凌駕別國。

總括而言，面對現時國際上的各種糾紛和政治較量，筆者認為，中國可借鑒毛澤東「不打沒把握的仗」的軍事戰略，掌握主動權，選擇適當的時機出手，並配合鄧小平「船長養晦，不強出頭」的指導思想，採取自強不息的發展政策，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作者為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大和解」是穩中求變保障

□宋小莊

候任特首對未來施政提出「穩中求變」的主張，也體現了傳統文化中「和」以及「用中」的思想。這個道理不但在制定施政綱領是如此，在處理新舊政府交接、處理建制派內部矛盾、處理兩大陣營的矛盾，最後實現全社會的「大和解」，也是如此。

大和解 大家談

自中央提出香港特區要實現「大和解」以來，筆者一直關注香港社會的動向和媒體的反應。儘管有人說，與梁沒有結怨，不存在「大和解」的問題；也有人說，由於涉及意識形態和利益的衝突，「大和解」是不可能實現的目標等等。但公開與「大和解」唱對台戲、否定「大和解」論的情況，似乎不多。這是香港回歸以來罕見的社會現象，說明中央的「大和解」政策是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也是廣大市民擁護的。

施政成敗繫於「大和解」

然而，對「大和解」的內涵，香港社會的解讀並不相同。一般人認為，這是候任特首梁振英對全體社會的和解，也是全體社會對新任特首的和解，是為修補香港因學習西方的民主選舉文化造成的社會撕裂。又有人認為是統戰。但由於香港社會劃分為建制派和反對派兩大陣營，各陣營又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團，「大和解」不可能是簡單的握手言、吃吃飯、聊聊天，而是長期的、複雜的、高智能的、系統性的社會工程。未來五年新任特首施政之成敗、順暢，在某種程度上將繫於「大和解」的進展。

中華民族是講究「和」的民族，中華文化是講求「和」的文化。中國古代民間傳說就有「和合二仙」。《聖經·創世紀》也有「和平鴿」的故事，佛教法相宗也指形成心（精神現象）、色（物質現象）諸法的因緣能夠和合的性質和合性（Samagri）。可見「和」也具有某種普世價值和意義。

指點香江

新特首提出「穩中求變」，注重解決深層次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是縮小貧富差距。香港貧富差距的鴻溝巨大，雖然香港已很少絕對貧窮，我們在香港不容易找到乞丐，飢餓的情況也很少，但是相對貧窮嚴重。基尼係數是一個廣泛用來衡量不平等和收入分配不平均的指標。香港的基尼係數是53.3，在全球發達經濟中是最高的，僅低於非洲和南美洲的15個發展中國家。這已經顯示香港政府的政策出了問題，因為以香港較好的經濟條件，應該可以在國際比較中表現得更好。

相對貧窮一直在過去十年惡化，基尼係數一直保持增加的趨勢，顯示不平等的狀況惡化。統計顯示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收入在過去十年沒有增加。

政策錯誤導致貧窮

諷刺性的是香港的失業率只有3.2%。低失業率通常不會與高基尼係數同時發生。也許這說明香港人是勤奮的，並且正努力改善他們的生活情況，同時也更顯示相對貧窮的原因是錯誤的政府政策。

有些人認為一定程度上的收入不平均是正常的，因為付出努力和具創意的人理應拿到更高的收入作為獎賞，而且許多發達國家都經歷過一段高基尼係數的時期。但問題在於香港的基尼係數持續處在高位，並保持增勢。

關鍵的是，富有的可以更富有，貧窮的依然貧窮，從貧窮到富有的流動性很小。若貧窮人口看見有機會改善他們的狀況，他們的不滿不會太大；反

在中國，「和」被古代思想家賦予哲學內涵，是具有大智慧的。早在西周末年周幽王時期的太史史伯就提出「和實生物」的命題。《國語·鄭語》載有鄭桓公與史伯關於周代弊政的對話。史伯認為關鍵的問題是周幽王「棄和而取同」，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他選擇釋說，所謂「和」，在常理上，就是「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肢以衡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營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夫如是，和之至也。」這就是凡事不能「求同」，只能「致和」。

治理香港需要智慧

在政理上，就是「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色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這些話，說的是很深刻的。

古人講話，言詞簡奧。在哲學上說，就是沒有對立的事物就難以發展，而兩個以上對立事物的矛盾統一會產生新的事物，這就是「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命題。這個道理不難理解。

候任特首對未來施政提出「穩中求變」的思想，也體現了「和」以及「用中」的思想。在頒發任命狀時，溫總理對候任特首的「穩中求變」給予高度的評價，認為穩不求變，變不求穩都不好，要在「穩中求變」中實現「穩中求進」的目的。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對「穩定大於一切」的反思、是對香港事務片面求穩、片面求變的揚棄。

應當指出，「和」及「用中」的前提是有「兩端」的存在。「和」及「用中」既強調了矛盾的對立，又強調了矛盾的統一。例如穩與變，就是一對矛盾。穩是要求穩定，希望穩定就不願意變；變是希望改變現狀，改變現狀就可能不求穩定。如果片面強調對立，就往往穩

「穩中求變」緩解貧富懸殊

□余永賢

之，若看不到改善生活狀況的可能性，將會激起不滿和憤怒。另外，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不僅是為了避免社會不安；基於公平原則，我們必須提供公平的機會給香港人去改善他們的生活。從經濟的角度看，當所有人都有一個公平的機會去發展個人能力並應用於經濟發展，香港會更加繁榮。

為什麼香港的貧富懸殊如此嚴重？有三個主要原因：高地價政策和不受限制的炒賣導致了不合理的資本成本；沒有注意經濟多元化；缺乏大學教育機會。

四十多年來持續的高地價政策不斷把香港的房地產價格推高，昂貴的房地產已經成為許多行業發展的嚴重障礙。對自由市場的迷信使投機活動失控。富有的人因炒賣變得富有，這本身並不是一件壞事，但過多的炒賣活動把其他經濟活動擠擠出去了。另外，高房地產價格使貧窮人的住屋開支增加，生活更困難。

此外，政府沒有經濟多元化的政策。1979年，曾經有一個多元化委員會，但之後多元化就讓路給放任自由市場，不單沒有多元化的政策行動，反而有直接的政策去促進單一的金融行業發展。香港需要經濟多元化才能提供多種工作，增加職業流動性，這是達致更理想的收入分配的關鍵。

教育是個「彌合」機制

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大學教育。大學教育對就業流動能力來說非常重要。香港只有17%的成年人口有大學教育，我們沒有足夠的大學畢業生。香港需要更多的大學畢業生去創立和營運知識密集或技術密集的企業。

紓緩貧富懸殊的策略就正是從這三方面入手。

而不變，或變而不穩。如果片面強調統一，結果就會既不穩也不變。只有解決了穩與變的辯證關係，才能「用中」，才能實現「穩中求進」。

這個道理不但在制定施政綱領是如此，在處理新舊政府交接、處理建制派內部矛盾、處理兩大陣營的矛盾，最後實現全社會的「大和解」，也是如此。但也要知道的是，矛盾的轉化是有條件的，也是有原則的。在中國古代也不乏善於實現矛盾轉化之佼佼者。例如春秋末期的孫武，他在處理「利與害」、「衆與寡」、「強與弱」、「攻與守」、「迂與直」、「奇與正」、「勇與怯」、「虛與實」、「致人與致於人」等方面，就體現了高超的智慧。管仲也是此等人物，《史記·管晏別傳》認為其為政有兩個特點，一是「與俗同好惡，……故論卑而欲行。俗之所欲，因而爭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二是「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

「零配額」符合市民訴求

以「雙非」問題而言，似可符合《史記》所述的特點，可以好惡同俗，轉禍為福。針對現任政府研究2013年私家醫院的配額問題，候任特首提出2013年應當「零配額」的目標。這迎合了大部分市民的訴求，也表明了政府交接的原則，要由現任政府配合未來政府的工作，而不是相反。

然而這樣做也給現任政府和私家醫院造成困惑。筆者雖然完全同意「雙非」問題是法律問題，而不是行政措施的論斷，也主張行政長官是可以「對症下藥」的最適當人物，但候任特首還有必要提出確能解決這一法律的簡單方法，才能處理好新舊政府交接產生的矛盾。對如何實現「大和解」，但願候任特首有更好的、也更有智慧的、可以轉化矛盾的舉措。

作者為法學博士

首先，要採取步驟抑制樓價上升，減少家庭住屋負擔，並為低收入家庭提供適量的公屋和居屋。另外，應提供土地給中小企業廉價使用，舉例來說，政府可以購買空置的工廠大廈，然後廉價出租給中小企業。不過，活化工廠大廈未必是好主意，因為這可能鼓勵業主提高租金。

第二，政府應該推行促進經濟多元化的政策。因為金融是高增值的行業，多元化的方向就是催生其他高增值的產業，提供的職位要有相當的新薪水水準，否則不可持續。高增值的產業就主要是知識密集或技術密集的產業，但不一定是高科技的產業。這就是為什麼溫家寶總理忠告香港：「發展小型的科技創新企業，以增加就業。」

第三，增加大學教育的供應最為重要。創立和營運知識密集或技術密集企業都需要大學畢業生。短期來看，大學畢業生的增加似乎會減少畢業生就業的機會。但從較長的時期來看，當足夠的大學畢業生凝聚的時候，就有創新能力去創立他們自己的公司。

香港不少人在一整天的工作之後，匆匆忙忙去參加課程，提升個人發展，明顯可見社會對教育的需求和壓力。這些課程雖然昂貴，所提供的教育產品質量卻參差。

職業訓練局一般提供文憑水準的訓練課程。然而，這種程度的訓練通常不足夠，因為要創辦高增值的生意，通常需要比較高的教育程度。不過，一旦高增值的企業已經成立，受過這些訓練的人可以擔任支援的角色。

教育是對貧窮的終極解決辦法。教育是富人和窮人之間鴻溝的彌合機制。教育幫助貧窮人自我更新，打開隔代貧窮的鏈鎖。

作者為應用科技研究院顧問